

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

作者：皮传荣

[摘要] 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当我们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不难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一是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如渲染“朱坚强”以娱乐受众，炒作“范跑跑”而有失严肃；二是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受长期养成的习惯思维的左右；三是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 汶川地震；突发事件；媒体报道；新闻业务

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开明和开放政策与态度，使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地震的渐渐远去，当我们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我们发现媒体的表现谈不上尽善尽美，有得有失，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在今后的报道中进一步地改进和提高。

一、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

地震发生之初，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摒弃一些轻松、娱乐、谐趣的新闻信息，屏蔽几乎所有的杀人放火打砸抢的新闻，而是和全国人民一起流泪、尽一切可能报道与灾难有关的信息，为救援工作鼓与呼。但是，一段时间后，媒体新闻娱乐化的本性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为了取悦受众，媒体有意无意开始寻找一些趣味性的信息，新闻娱乐化的阴魂不散，阴影犹存。“朱坚强”就是一例典型的被媒体娱乐化了的新闻事件。

(一) 渲染“朱坚强”娱乐受众

一场大地震过后，人们发现了一头猪在废墟下坚持了36天，居然奇迹般地生还了，于是，有人给这头猪起了个非常坚强的名字：“朱坚强”。于是，一家博物馆准备收养这头猪，而且该博物馆已经准备为它申报“世界吉尼斯”。博物馆的人可能是想号召全中国的家畜都向它学习，在下次灾难发生时，尽可能坚强地活下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人类能像猪一样在灾难面前一直坚强，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媒体对这个新闻事件情有独钟，大肆炒作。中国人喜欢树典型，树形象，将“朱坚强”树立为动物和人类学习的典型、行动的楷模，新闻媒体蜂拥而上，不惜花费大篇幅、大版面，不惜浪费电视和电台宝贵的时段，把“朱坚强”炒作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朱坚强”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在这次地震中坚强地生存和活着的人类，新闻媒体以此来树立典型非常不严肃，而以此来娱乐一把灾区之外的受众倒是媒体心照不宣的真实意图。

(二) 炒作“范跑跑”有失严肃

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不管学生，自己一个人先跑出了教室。5月22日，范美忠在网络上发言为自己辩护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范美忠的言论，激起了网民的无比愤怒，有网民因此给他取了个名字：“范跑跑”，但随后，又有人出来同情甚至支持“范跑跑”。于是，媒体抓住了这样一个“难得”的题材，对“范跑跑”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起初，媒体是为了严肃地报道新闻，以期让受众思考有关道德、人性等深层次的问题。但是，随着地震的慢

慢远去，媒体的报道开始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媒体与其说是为了引导受众关注道德、人性、教育等严肃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新闻娱乐化，“范跑跑”在受众没有察觉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娱乐化的人物。每个媒体都在报道“范跑跑”的新闻中抢够了新闻，出尽了风头。只要有一条与“范跑跑”有关的信息，媒体就开始大炒特炒。一个信息其实只要几百字就够了，但媒体为了将这个事情“报道清楚”，不惜篇幅，不惜版面，有的报纸甚至拿出一个整版、几个整版来进行报道。

此外，关于对莎朗·斯通的报道，媒体不惜篇幅、追踪报道，不完全是为了民族尊严、为了人性、道德，更是为了吸引读者，抢眼球。还有对余秋雨的报道、对王石的报道，都有娱乐化的痕迹与嫌疑。

（三）一再“破纪录”黑色幽默

一个人在废墟下面能够坚强地活着，与时间抗争，这的确可歌可泣，媒体对其进行报道无可非议，但是，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镜头聚焦在少数几个“破纪录”的人身上，并且津津乐道谁谁是纪录的保持者，谁谁又打破了这个新的纪录时，这就更加黑色幽默了。这种“破纪录”的新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着受众的眼睛，折磨着受众的心灵：170小时、190小时、200多个小时……等等，最后，是一头猪破了新的纪录，并成为新的纪录的保持者。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人的名字：“朱坚强”。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有的主持人是这样进行报道的：“现在的记录保持者是……”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很容易使受众想到娱乐节目中的打播。生命的顽强一下子变调了，变成了戏谑。

“破纪录”的确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报道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媒体乐此不疲、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而且还将一头猪也加入到“破纪录”的行列中，这就有点黑色幽默了。面对这样的报道，受众可能很难在这里面看出对生命的尊重，至少是，受众对以坚韧的毅力活下来的生者的崇敬开始稀释、打折。这种“破纪录”的报道方式，基本属于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用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来报道严肃的救援工作，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报道方式，一个严肃的信息，以严肃的报道方式开始，最后却以喜剧的报道方式发展和结束，媒体应该对这种灾难新闻的报道方式多多反思、反省。

媒体之所以在严肃的地震报道中也存在着娱乐化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娱乐化倾向，其重要原因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新闻理念始终以新闻娱乐化为依归，把新闻娱乐化作为吸引受众进而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的核心元素，作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这种新闻理念不改变，新闻媒体的新闻娱乐化报道模式便会永远存在下去，今后遇到突发的灾难事件，新闻媒体仍然避免不了新闻娱乐化的思维模式和报道模式。

二、议程设置VS残酷的真实

本次地震报道，相关管理部门对媒体的管制并不是十分严格，舆论环境相当宽松。但是，我们的媒体已经习惯于设置议程，习惯于按照相关管理部门往常的要求和指示来采访和选择报道主题，媒体报道的这种议程设置是媒体长期的习惯性思维造成的。

本次地震报道，媒体的报道内容主要是报道抗震救灾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报道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诚然，我们的媒体应该以这些报道为主，应该弘扬主旋律。但是，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也可以允许媒体有一些对于灾害现场一些负面的报道。当然，这种负面报道应该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真实是第一原则，不能允许有半点虚构，不能为了负面报道而去编造事实，甚至妖言惑众，这就背离了新闻的基本原则。

在一个花园里，香花和毒草总是并存的，不可能只有香花，而没有毒草或者杂草。同样，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先进人物，就存在落后人物，有拾金不昧的人，也就有偷盗抢劫的人，更何况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为了生存，极少数人人性的弱点可能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毫无遮拦。

在5月22日和29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在灾区存在着偷盗现象。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就“有人偷烟”，而且是“在烟草公司偷烟，尽偷中华之类的好烟”，但这个小偷“被逮着了，送到了派出所。”“映秀镇医院门诊楼前停着几辆车，小车的车玻璃都完好，但所有的前车盒都是被打开的，票据散落一地，明显被翻过。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是映秀少数的房屋结构依然保存完整的建筑物之一。但银行保险柜被扔在了废墟上，里面空空如也。”“被抢的还有农行。”“12日地震当天夜里，就有人不顾生死钻进去了。”此外，《南方周末》还报道说，大量还在呼救的人正在“消失”；被压男孩为了说服战士先救自己而强调“我是班上第一名”；悲伤只在少数瞬间爆发、多数时候人们更象木头人一样站着；为了争夺一个煮饭的铁锅，村民也发生了一场争吵……

《南方周末》的报道内容是当时绝大多数媒体基本没有报道的，应该说，《南方周末》没有虚构和捏造事实，也没有夸大事实，而只是把灾区的部分事实以原生态的形式披露出来，这种事实是残酷的真实，令人心酸的真实。但这种报道内容突破了以往报道此类突发灾难事件时议程设置的内容，这是本次地震报道的一个重大突

破。在灾难来临时，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弱点同时闪现。在报道灾区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时，媒体没有屏蔽和隐瞒灾区极少数人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弱点。

在灾难来临时，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么遵纪守法，每个人都那么温良恭俭让，每个人都那么道德高尚、人性崇高，难免出现一些负面的现象，那么，记者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就有必要也报道这些负面的信息，这既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也可以起到抑制、缓解这些负面问题的作用。如果媒体不报道，有关方面因为不知情不会引起重视，事情的解决会缓慢一些。

有人认为，类似于《南方周末》这样影响比较大的报纸，如果习惯于从重大新闻事件的中性或阴暗面来揭示问题，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还有观点认为，在全国军民奋起抗击四川地震灾害的时刻，《南方周末》刊登大量文章，揭露抗击地震灾难中的阴暗面，是不合时宜的。其实，阴暗面和光明面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完全的光明面，也不存在完全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会有阴暗面，如果我们在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只考虑光明面而不考虑阴暗面，那么，这样的报道是不全面的，不全面的报道显然就存在着真实性令人质疑的问题。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正式实施，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信息公开，不仅是对地震方面的正面信息公开，对负面信息也应该适度地公开，负面信息的适度报道，同样是对谣言的重大打击，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受众对信息有知情权，既有知悉正面信息的权利，也有知悉负面信息的权利，如果媒体只报道正面信息而不报道负面信息，则没有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是对受众知情权的剥夺，是与这项法规的宗旨相违背的。

事实上，《南方周末》等媒体只不过先行一步，对于灾区偷盗现象、灾民对学校校舍等建筑物建筑质量的质疑、有人假借救灾之名为自己牟取利益、有的官员贪污救灾钱物……这些“阴暗面”，其他媒体后来也开始陆续报道出来，只不过有的媒体报道得早一点，有的媒体报道得晚一点而已。

因此，本次地震报道是对以往媒体突发灾难事件报道议程设置的一个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地震报道对媒体报道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三、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

媒体在采访报道时，应该对报道对象给予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媒体更应该如此。应该说，在本次的地震报道中，媒体在对采访报道对象实施人文关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比如，我们在电视上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就很少看到血淋淋的画面和图片，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画面和尸横遍野的图片也没有被显目地报道出来，这相比以往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媒体报道的人文关怀缺失，并没有因为这些进步就得到彻底地改变，以往一些不规范的采访报道方式和不规范的言行还是在采访报道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

（一）报道大于一切

在灾难面前，救援大于一切。但是，有的记者表现出报道大于一切的倾向。在灾区某地现场，有个营救员正在抢救伤病员，但由于这个营救员挡住了摄像机位，一位主持人却对营救员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救人要紧，这位主持人却说：“只要5分钟就好。”5月17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一名幸存者时，俄罗斯救援队员发现，记者采访的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这让俄罗斯救援队员非常生气。一位记者在直播时竟然进入手术室采访，强行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还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耽误医生重新消毒的时间，以及病人的手术时间。在飞机上，有记者还要和被压125小时的伤者对话。被埋了几十上百个小时，伤员已经很虚弱了，记者们还要追着左问右问，这有可能耗尽伤员们最后一丝能量。

是救援工作要紧，还是新闻报道第一？显然，救人应该大于一切，而不是采访报道大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应该让位于救援工作，新闻采访报道也不能例外，不能为了报道而影响救援工作，更不能为了报道，为了要镜头画面效果，而漠视生还者对生命的渴望。“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明确”的“原则”。 [1]

（二）媒体煽情

媒体报道灾民的苦难，报道受伤者的处境，能够唤起受众的同情，激发受众的善举，这对被报道者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如果媒体不把握好度，过分地渲染灾民的苦痛，这就成了煽情，虽然也能够更进一步地博得受众的同情和帮助，但对灾民来说，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创伤。

某些媒体的记者反复问灾民：“你家死了几口人？”如此之类的问题，一遍遍让灾民回忆那些让他们心碎的场景，折磨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一位女民警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女儿。男记者冷漠地问她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最后问道：“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

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女民警悲伤得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类似这样的提问，可能会感动电视机前的受众或手拿报纸的读者，让他们留下同情的眼泪，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这无疑是在被采访者伤口上撒盐，加深他们心灵的痛苦。1997年由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通过的《英国新闻工作者业务准则》，就明确要求记者“在涉及个人不幸与震惊的事件上，必须以同情、谨慎的方式进行询问。”[2]（P 419）因此，面对灾难，媒体应该尽可能地让外界了解灾难真相，尽可能地以同情的方式谨慎发问，而不是过分地煽情，利用伤者的痛苦和泪水，以赚取更多的眼球。

（三）媒体轰炸

地震过后，灾民需要消除恐慌心理，灾区的学生更需要心理治疗来摆脱地震所带来的阴影。灾民在精神方面需要关爱，但也需要平静和安静，如果媒体一遍又一遍地去采访报道他们，这种“骚扰”式、轰炸式的采访，会对伤者进行反复刺激，不利于伤者恢复心理健康。

在这场灾难中，很多人失去了亲人，还有一些人正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坚守在救灾一线。他们不仅需要身体上的休息，也需要精神上的缓和。但是，媒体对幸存者的过分关心和报道，很有可能给幸存者带来“次生灾害”。比如，那位被埋在废墟中唱歌等着被救的9岁小学生，因媒体和热心人的“过度关心”，以致于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因此，很多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都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和关心要有节制，不要因此加重当事人的心理负担。这种媒体轰炸式的采访报道，对灾民来说，不是帮忙，而是添乱；不是减轻痛苦，而是增加伤害。

面对灾民，记者应该遵循新闻职业道德中“减少伤害”这个原则。这方面，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有表述。由德国报业评议会与报业协会合作起草的德国《新闻业准则》（1994年修订）提出：“当（新闻工作者）不尊重受害者的痛苦及其家人的感情时，即超过了对事故或灾难进行报道的可以接受的界限。不得使已遭受不幸的人因媒体的不得体报道而再次受到伤害。”[2]（P 423）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的《职业伦理规范》也要求记者在采访报道时，要“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尤其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1]

（四）媒体逼捐

捐助应当是自愿的。一个人，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他捐多捐少，都是对灾区人民的一份心意，都是在为灾区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不能指责谁捐款捐得太少，这种指责就带有强迫性，是对捐款人意志的强迫。每一个捐款者都应该被感恩，社会都应该铭记他们，是他们的爱心温暖了灾区人民的心。但是，后来的捐款开始变成逼捐，甚至直接指名点姓地批评企业界、体育界和影视界的富翁。虽然有人说，逼捐是那些无头脑的网络暴民酿成的。但是，媒体在逼捐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没有媒体的配合与推动，网络暴民的“逼捐”会偃旗息鼓，至少不会形成汹涌澎湃的潮流。事实上，逼捐是在人性化的观念下产生了非人性化的结果，媒体一味迁就受众，一味以受众为上，做出了一些非理性的报道。

与上面媒体伤害的对象不同的是，媒体伤害的不是灾民和伤者，而是对灾民和伤者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关心、支持和援助灾民和伤者的捐助者，这些人也要得到媒体的人文关怀，而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打击他们的爱心。

新闻媒体对采访对象给予人文关怀，这是一个老话题，每一次的突发灾难事件发生后，总是有一些媒体，也总是有一些记者和编辑忽视对报道对象给予人文关怀，虽然本次地震报道在这方面比以往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缓慢的，媒体对报道对象的人文关怀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作者简介：皮传荣，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陈力丹，王冠.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和对传媒未来的影响[J].当代传播，2008（3）.
- [2]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19.

上一篇: 提速 提质 提效——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创新路标与路径
下一篇: 突破“没有新闻的角落”

>> 相关文章

- 强化舆论监督背景下的《新闻联播》变革分析
- 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四个要点
- “准新闻业者”阅读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 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根”
- 感悟“延安行”愿做永远的新闻行者
- 重大报道策划如何操作—《新京报》“日志中国”系列策划的操作案例
- 仅仅在路上
- 假如我是实习生

发表评论



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 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 阮思聪 QQ: 54746245 Powered by: 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